

陳若曦論

年々から、わたし

しかし、わたしは、陳若曦のこの考えには、ほとんど全身をゆだねるような感動をおぼえた。わたしもまた、同様の命題を自分のために樹立して、その命題に、いざば自分を賭け、自分を従属させてきたの

竹内実作

陳若曦論

中国人の

譯

〔譯按〕 本文原作者爲日本著名的中國文學專家，亦爲研究中國大陸情況的權威學者。一九二三年生於我國大陸，能操一口流利純正的中國語，現任京都大學教授，並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班。近已陸續譯就陳若曦的作品多篇（篇目及發表情形見上期本刊「同聲」），不久並將結集出版。

〔作者說明〕 此文登在『亞洲季刊』（每日新聞社）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月號。現在做文字上的修改，投稿于『書評書目』雜誌。可能雜誌篇幅有限，關於刪削事完全委託編輯先生任意處理。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一九三八年出生於臺灣。

臺北的國立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並結婚。一九六六年偕夫婿回返大陸，在北京住了一段期間之後，在南京當一名英語教師。回大陸後不久，遭逢文革，備嚐「革命」的風暴。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得到正式許可，與丈夫携二子離開大陸，在香港呆了一陣子後移居加拿大迄今。滯港期間在『明報月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上發表描寫文革一個樣相的「尹縣長」，受到注目。接着，又在該刊發表「耿爾在北京」「晶晶的生日」，在臺灣的報紙上也刊出「查戶口」「任秀蘭

」等，均爲以居住大陸期間的體驗爲本寫成的作品。

她的祖父、父親都是木匠，所以大學的學費都是當家庭教師掙來的，在學期間參加英文系的同學們所辦的『現代文學』雜誌，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但是居住在大陸的七年間，她隻字未寫。據云：離開大陸後，在大陸時所接觸的人們的種種切切，經常在眼前隱現，驅使她從事創作。

臺北的遠景出版社刊行了中短篇小說集『尹縣長』『老人』，聯合報社上梓了長篇『歸』，英譯本則由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出版部印行，西蒙·雷執筆寫序

，雷氏並將有法譯本出版。

這裏得先聲明：我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有關她的經歷，才有了關心的。

事情緣於今年元月間，我收到了一份從臺灣帶來的禮物，就是這本短篇小說集（編按：尹縣長，遠景版）。送給我的青年是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元月間曾返臺省親。他也寫小說，我沒有看他的全部作品，但偶然閱讀的一篇倒是相當可觀。

這位青年告訴了我如下的傳聞：

——陳若曦曾在美國留學，並到過大陸（中國本土）。然而，她想結束在中國大陸的生活，希望能夠出國，却遲遲未獲准許。

尼克森訪問大陸以後，海外的中國人學者陸續有人往訪大陸，周恩來接見了這些人，表示歡迎回來中國，參加「祖國」的建設，並明言隨時都可以回來，也隨時都可以離開。

一位學者反駁說：事實並非如此。周恩來吃了一驚詢問，那位學者便舉出這位作者和他女婿的名字。周恩來馬上批准出國，作者一家人這才得了正式的許

可，來到香港。……

我被觸發了好奇心，馬上開始閱讀那本短篇小說集。

由於所受銘感良深，所以也在某報的不署名專欄裏，介紹過這本書。

不過我這倒不是第一次讀這位作者的作品。前面已述及，她的離開大陸第一篇作品是「尹縣長」，當時我就在『明報月刊』看過，記得我曾為打從山上吹襲而來的冷風、以及為人天真正直、因急遽轉變的命運而手足無措的主人公，感到瞿然心動。然而，其後接連有「批林批孔」以及周恩來、毛澤東之死，大陸上變局不斷，迫使我忙亂不堪，以致漸漸淡忘了這篇小說作品。（譯按：本文作者因係以研究大陸情況為主，故每有變局發生，輒須探索分析，並撰寫論文以應各方需索。）另外一層，乃是因為在我來說，這篇作品裏的事件，雖然是悲慘的，却也並不算意外。

在日本，我也有曾經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中國朋友，我聽他說過在中國大陸曾一度身繫囹圄。二十幾年前，我送過他離開東京回返「中國」，並通過二三次信，也曾托人帶去磁石式的攜帶圍棋盤。記得也在北

京見過一面。我非信神的人，但我願向神發誓，他從來也沒有向我講過或在信裏提過中國大陸的內幕或牢騷。這樣的人，在文革最早的爆發已過去了一九六八年秋間，竟而突然被捕下獄，且受到刑求。他的罪嫌，要之是由於在日本逗留的期間很長，所以一定向日本人說過某些有關大陸的「負」的一面。過了七個月，突地又被釋放。然後他申請出國，苦等了幾年之後，好不容易地才來到日本。……

然而，在一般讀者，即『明報月刊』的讀者來說，他們不像我這般浸淫於文革的追跡，故而這篇作品似乎頗能給予他們有關未知的領域的活生生的知識。也許，作者本人的經歷遭際也靠口傳而傳揚開來。她的回歸中國大陸以前的朋友們，想來也是因為此篇作品的署名而知道了她已離開大陸。

『明報月刊』繼而又連載了「耿爾在北京」。我貪婪地閱讀，每次都簡直等不及下一期。——然而，說不定我的讀法，並不是作者原本意圖中的那種讀法。我對作品中所描寫的北京市民生活的細節，感到強烈的興趣。

不怕招致誤會地說：小說作品，非描寫風俗便不

能成立。當然，不是這樣的小說，我也不否定其文學價值。但是，描寫風俗的地方使我們感到確切的存在、確切的文學，却也是事實。然而，風俗是會變遷的。故而小說必需捕捉新的風俗。——這一點，當然祇是我個人的感想而已。

讀小說時，我常感到不安的心情。我擔心被騙。日本的小說也好，中國的小說也好，這樣的不安都會纏住我。總之，如果讀了無聊的作品（因為非讀完便不知是否無聊），便因為所花的時間而感到痛惜。故此，每當閱讀小說時，尤其是閱讀中國的小說時，不知不覺間便有了一窺展現風俗的窗口的心理準備。但是，偏偏中國的小說極少描寫風俗，例如裙子，不錯，它確能代表風俗的一端，可是這裙子的長短是膝上幾公分呢？便往往不見交代。於是你必需從另外的方式——例如中國大陸不可能流行迷你裙——來補充着知識讀下去。

但是，「耿爾在北京」裏，居然展現出精細的北京風俗圖，因此，我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話雖如此，不過「尹縣長」倒沒有像「耿爾在北京」那麼充滿風俗色彩。然而我個人確曾一度在從

鄭州到成都的路上，打從火車車窗看過景色，覺得那些山地的某個地方，即令有着像這篇小說裏所描繪的小城鎮，也一點不算意外的感覺。不過這篇短篇，在她的作品裏，毋寧應該屬於有意挖掘文革真相的系列；如果說有關文革的某些幻想，尚殘存於讀者心中某個角落，那麼我覺得這篇作品對這幻想是有着打擊力的。當然，正如作品本身所顯示，作者並不以為單純地把事實暴露出來，便算盡了能事。

這種描寫文革的系列作品裏，另外尚有「晶晶的生日」「任秀蘭」等。此外，相繼上梓的短篇小說集『老人』裏，也收錄有數篇屬於這個系列的作品。尤其「老人」與「尼克森的記者團」，我覺得最能發揮出這個系列的特色。

說不定作者——做為譯者的我也是——會被加上某種封號。好比「反中國」啦，「反共」啦，但是我倒以為作品本身已經反駁了這個封號。加上當今中國大陸，批鬥四人幫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比這些作品所寫更殘忍、更悲慘、更醜惡的事實，都給抖出來。

然則當今的中國大陸，會感謝這位作者嗎？我以為值得懷疑。不為什麼，祇因現居中國大陸本土的小

說家，還沒有拿出像這位作者所寫的剔抉事實的作品。我還認為，這一點正好證明尚有嚴厲的限制，加在文學、藝術上面。他們還沒有自由。並且，我甚至還覺得，他們針對不自由的事實，具有拼命掙扎般地求取自由的這種意志，說不定已然消失了。

當然，關於四人幫被捕以後的看似略趨明朗的社會空氣，我也知悉一二。然而，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那可不是像日本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戰敗以後，我的思維裏從頭到尾都整個一變而為自由與民主主義的情形。至少就『人民文學』『文藝報』等雜誌所看出來的而言，我不得不感到，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還不是完全自由的，是還有束縛的。

因此之故，如果從中國本土來看陳若曦，當可預料到所可能給予的分數，應是很微妙的。然而，這一點倒可能正好顯示出文學的力量。

文學原本就是無力的存在。不管陳若曦如何拼命使勁，四人幫不可能會倒下的。扳倒四人幫的，還是要靠華國鋒的槍桿子。

然而，她的作品，正在海外的中國人知識份子之間發生影響。當我在傳聞裏輾轉聽到說，他們開始覺

得還是不要輕易地就同中國大陸好的時候，我便不禁想到筆還是比劍強。就是從我所體味到的印象來說，比起新聞報導或理論性文章，這些文學作品更能強烈地使我們瞭解文革「中國」、批林批孔「中國」。我們禁不住地像那些作品中人物一樣，摒住氣息等待政治的風暴過去。從文學作品所得到的東西來做為「發子」，讓自己的思考膨脹、擴大。

開始的時候，陳若曦對成立於中國本土的國家，抱有熱烈的憧憬。她在大學畢業的次年（即一九六二年）到美國留學，首先在一家大學就讀，然後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創作系，兩年後畢業。正如她自述：「這兩年間，我忙於戀愛與政治」，這裏所說的「政治」，想像中可能就是對共產中國發生共鳴，閱讀有關共產中國的書籍，參加討論會。並且那戀愛可能造成與現在的夫婦的婚姻。然後，她與夫婦相偕，經由歐洲進入中國大陸。

但是，夫妻倆抵達北京的一九六六年秋，文革已經開始，處理他們兩人的機構本身捲入這場漩渦裏，足足有兩年那麼久，使他們在北京的旅社待命。然後，他們被指派到南京的華東水利學院。她在那兒當了

一名英語教師。

水利學院似乎是專門培養有關「水道」的人材的學校。她的夫婦是流體力學的專家。「流體」與「水」、「水道」有關，這就是指派這個工作給他的理由。到了南京不久，夫婦又給遣到江蘇省的一所農場「五七」幹部學校，她則有段時間在收容雙親都到農場而沒有人照顧的孩童的托兒所工作。

為期七年的大陸生活快要結束時，是否真地發生過傳聞中的向周恩來直訴事件，我還沒有向她本人求證，不過她的申請出國，很明顯地是由於「憧憬」變成「失望」所致。

離開大陸後，在一場美國或者在加拿大的演講會上，她被詢問離開大陸的動機，她的回答大意是說：那是因為原本有的一個信仰，如今已經失落了。

我想正如同對一個信仰者，不能責備其信仰一樣，對失去信仰的人，也不能責備其喪失信仰。尤其是當一個人有了信仰，而他又以一個信仰者，對其信仰盡了忠誠的時候。她既不是存心搜集寫作材料才進入中國大陸，也不是預計離開大陸後能成為某種英雄才離開大陸的。她祇是一個信仰者，以一個人，而為所

當爲而已。

大學在學期間她就染指小說創作。以中國的當代小說而言，我認爲她已達到比諸丁玲、蕭紅毫不遜色的水準。但是，在中國大陸的七年間，她沒有寫小說，也無意於此。有一次爲了出大字報，抄寫報紙上所發表的一些老套。她忽然衝動起來，寫下了一二行自己的想法，結果惹得組長大皺眉頭，弄來弄去地修改了半天，終究未能成篇，失去了發表的機會。她說：這就是七年間唯一的「創作」。

據稱：離開南京前夕，有人過訪，請求她到了國外之後，能將現實狀況寫成文章發表，她拒絕了。

「耿爾在北京」的主人公有如下的獨白，想來這可能就是她的心境：

歸根結底，我是中國人，他對自己說，自己怎麼感受是個人的事，捍衛國家的尊嚴，却是義不容辭的。（譯按：見陳著『尹縣長』）

然而，她還是再次拿起了筆。關於這一點，她有如下的話：

在香港的一年間，還有來到加拿大以後，我一直都不以爲我會再次提筆。因爲我早就被「洗腦」，所以相信不會再拿起筆來。

然而，我在大陸七年間，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幾個人。我一直都惦念着他們。許多人的遭遇，使我同情。於是懷念之餘，我終於還是提起了筆，當做一種娛悅（請想想香港今天的稿費，我絕不能指望靠它來生活的）。

除了這以外，在中國大陸，個人都受到很大的壓迫，沒有發表的自由。我想，我既然知道他們心中想說出來的話，那麼我就有替他們發言的責任。但是，我不願意說我是「爲民喉舌」。不是的，我是個極現實人。我祇不過是代替知識份子發言罷了，因爲畢竟我所接觸到的爲數不少的人都是知識份子。

我想，「中國」如果客觀條件轉變，人民定然不會選擇共產主義的政治方式。然而，目前正在「創造」着他們的歷史。

因此，我還是反對這個制度——其實我祇是

「批評」，並不想口號一樣大聲疾呼來「反對」。

那是不必的——但是，我絕對不反對那有着數千年歷史的中國。（譯按：這一段文字係從日文譯過來）

這就是說，腦子裏的人物逼使她執筆。

她還有如下的話：

以前，我做爲中國人好像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了解到中國人民原來是既悲且壯，可愛復可敬，那怕是最平凡的一個人，本身也是數千年歷史文化的結晶，自有尊嚴，絕非一個專制的政治制度所能改變的。（譯按：見陳著『尹縣長』）

爲陳若曦的英譯本寫書評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弗德烈·魏克曼在引用了右列文字之後說：「這不是複雜的觀念，但也未見十分明晰」（『紐約時報書評』七月二十日）。這是否說，在西洋人，一方面服從於政治制度，而且又超越它的人，是不可想像的嗎？

如果對某種政治制度不滿，那就應該對它表示反對，發動抵抗運動，或者逃奔——這位書評執筆人似乎有着明明白白的這種想法。（但是，也並不是說作品因而就顯得弱，或者價值低的意思。）

然而，陳若曦的這種想法，使我感到全身受到震撼般的激動。我也是給自己樹立了同樣的命題，爲了這個命題，拿自己來做爲賭注，讓自己隸屬過來的。自從一九六一、二年前後，我就確定了如下的命題：

我心中有我的中國，我就拿它來做爲對象吧。

有中國人的地方，即有中國。

偶而有看過我的文字的讀者，好比在演講會之際向我詢問：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資料來做參考？我說：不，祇有像『人民日報』等一類可以在日本買到的東西，利用航郵訂閱罷了。香港、臺灣的刊物也有一些。有時也會有報社或雜誌社給我看一些特別的資料，但有些是要我鑑定真偽的，平常那種東西是不會有

我的份兒的。對方似乎還將信將疑的樣子。

當然，即使如此，我與陳若曦是不可能一致的。

我之所以特意引述了她對超越體制的中國以及中國人的親愛與尊敬的文章，乃是想給讀者提供在面對預料中的誤會而下其判斷時，充做參考的資料罷了。

陳若曦的作品集英譯本裏，西蒙·雷寫了一篇序。他說：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多數屬於中國傳統的，並且經毛澤東否定過的「八股文」系統，而陳若曦則屬於另一個中國文學傳統，即流浪者、邊際人文學的系統。他還說：後者，也未嘗沒有在中國大陸從事創作的可能性，唯因整個社會受到嚴格的統制，故而在時間上、心理上，都沒有從事那種創作的餘裕。

中國大陸文學的文壇情況，存在着受到這種分析也是無可如何的一面，這一點我也承認。

西蒙·雷確定臺灣是「反共」的，並說她的作品起初在臺灣被禁止出版，然後為了文章在宣傳上的功用，始轉變為經過「處理」之後予以出版的方針。

臺灣的『聯合報』在譯載這篇西蒙·雷的序全文時，加了編者按語說明：有關方面迄未有正式的公開評論；『中央日報』首先轉載「值夜」時，曾經引起

贊同與否的兩種議論；然後中短篇集『尹縣長』問世，才有了對這些作品的肯定性的評價。

根據個人看法，首先我們須問：「反共」這個詞，其具體的內容究竟為何？拿臺灣的單行本與『明報月刊』刊出的兩相對照，便知兩者不盡相同。例如「毛××」這種表現，臺灣版上特地加上引號「」。在中國的文章裏，引號含有保留或者反對的意思。例如日常口語上的毛××加上了引號，在小說作者來說，便是表示了對這說法不贊成的意思。我是相信，陳若曦在他的小說中是不會特意加上引號的。

在臺灣，好歹是把這本書印出來了，然則不出這本書的，甚至這樣的作品都不可能創造出來的另一個地區，究竟又如何？那裏，與「反共」地區比較起來，究屬明亮抑黑暗？

從讀者的立場來說，不管如何，作者的思想與感情，總算以一本書的形式傳達到自己的手邊，這一點是值得感謝的。並且，能够接觸那作品的世界，也是值得感謝的。而在作者來說，有讀自己的作品的讀者存在着，也是件值得感謝的事。

我就是試着，做了這橋樑的工作。